

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解读^{*}

周士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以色列国家安全在国际、地区以及国家单元三个层次上存在着结构性安全困境。以色列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存在着矛盾, 并往往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安全诉求相互冲突。以色列希望通过维持均势、建立战略优势、改善安全环境的现实主义安全政策, 并未促使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桎梏。对两种博弈模式的分析说明, 只有在安全互信的基础上, 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建立切实有效的合作安全机制, 才是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 以色列; 国家安全; 安全困境; 现实主义; 安全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08)01-0024-04

对以色列来说, 维护国家安全是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最重要问题。自建国以来, 以色列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以色列政府和民众在国家面临安全威胁时, 总是不遗余力, 为力求安全自保甚至不惜先发制人, 预防性地发动战争。然而, 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 以色列取得了对外战争的胜利, 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仍面临严重困境, 仍遭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敌视、敌对与抵制。如何摆脱国家安全困境不仅成为以色列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而且将推动中东和谈的进程与趋势, 影响着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

一、以色列安全困境的结构性分析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 国际体系中没有中央权威, 体系中各单位(国家)之间是平等和相互独立的关系。无政府状态、单位职能的相似性及国际权力的分散分布成为国际体系的实质特征。^[1]国际体系是一种自助体系, 以安全竞争为基本互动关系, 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约翰·赫兹认为, 每一个国家都始终担心受到对方的侵害, 尽可能增强实力以求安全, 而这又必然使对方感到不安全, 从而尽可能地增强实力以防不测, 结果进一步加剧了相互间原本的安全担忧。^[2]罗伯特·杰维斯认为, 一方增强安全会削弱另一方的安全。每一方都认为对方不仅是潜在的威胁, 而且是现实的敌人。国家既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被视为威胁性行为, 又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源于对方的侵略性。^[3]

以色列国家安全存在着国际、地区和国家单位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安全困境。所谓结构性安全困境, 是指在特定的国际安全结构中, 处于同一体系的行为体之间出于对安全不同诉求而导致的安全竞争态势。处于这种安全困境中的各行为体间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 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激烈对抗。^[4]在这种安全困境的主导下, 国家之间的信任机制难以构建, 国际安全合作难以实现。

(一)国际安全层次。尽管国小人少, 但以色列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国。以色列属于联合国的成员, 在众多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冷战时期, 以色列安全形势的变化集中反映了美苏在中东的安全竞争。以色列对外战略及行为既得到过外部大国的袒护怂恿、支持合作, 也受到过他们的干预和干涉。^[5]在国际安全格局中, 美国既是以色列的战略伙伴, 也是以色列赖以生存的最后保障。冷战后, 尽管不完全认同以色列实施对外政策的方式, 欧盟、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等都与以色列维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二)地区安全层次。以色列与中东其他国家存在着民族、宗教方面的根本矛盾, 实质是以色列与这些国家的安全认同错位问题。以色列人的主体为犹太民族, 信仰犹太教, 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民众大多为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和库尔德等民族, 信仰伊斯兰教。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宗教深入家庭习惯和社会风俗, 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 伊斯兰

*收稿日期: 2007-10-16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的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06JJDJW 009。

作者简介: 周士新(1972-), 男, 安徽霍邱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教和犹太教实际上是一整套维系阿、犹两种民族特征,构筑民族性格,强化民族凝聚力,反映本民族价值观念的复杂的文化体系。^[6]由于民族之间在历史上曾经历了长期的安全冲突,双方在安全认同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排斥性。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别促使犹太人对其他民族产生了严重的猜疑心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已经对以色列建构起强烈的敌对意识,并因为以色列在中东安全结构中的进攻型姿态而难以减弱。

(三)国家安全层次。对阿拉伯世界来说,以色列是一个侵入者,抢占了阿拉伯人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领土。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只是“回归家园”,回到犹太民族以前生活过的土地。因此,领土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水资源、难民问题等都成为历史和现实中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以色列几乎与周边所有国家,包括境内的巴勒斯坦都存在着严重的边境划分以及安全问题。460多万巴勒斯坦难民既难以回归家园,也难以得到周边国家的完全公民对待,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了这些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从整体上看,在国际层次上,冷战后时期,以色列国家安全环境已经得到了较大改善,以色列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在地区层次上,随着与埃及、约旦关系解冻,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困境得到了明显缓解。在国家层次上,尽管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具有不可协调的安全矛盾,但是冲突爆发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且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难以形成全局性的安全危机。历次阿以冲突表明,以色列既不能以消灭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为战略目标,也决不能允许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致命性威胁。

近年来,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阿拉伯国家针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战略意志大大减弱,以色列的战略进攻性增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主要是解决某些具体议题,即“定点清除”某些可能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目标。这种具有“先发制人”的行动维持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既预防性地消除了安全威胁,也没有引发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直接军事冲突。然而,2006年夏,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

二、以色列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选择

以色列将国家安全建立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导致了双方安全战略的不相容性。以色列目前并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领土,而是力图巩固已经取得的利益。以色列国家安全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整体安全的基本保障。从国家整体军事实力来看,以色列几乎拥有与所有阿拉伯邻国同时

作战的常规力量。尤其近年来阿拉伯世界严重分裂,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国家能够与以色列军事对决。当前中东唯一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只有伊朗,伊朗的“谢哈布型”系列导弹能够完全覆盖以色列。由于美国可能军事干预,在拥有核武器之前,伊朗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仍相当有限。

(二)国民安全的脆弱性。虽然以色列的国家军事力量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却无法保障国民的个体安全。^[7]自杀式人体炸弹等零星的恐怖袭击防不胜防,既对以色列国民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也使国民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和恐惧。虽然以色列采取加强国家安全,保障国民安全的措施,如修建隔离墙,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杜绝国民安全随时可能面临危险。

(三)潜在性。这包括两个方面:1.安全问题随时可能爆发。中东问题的核心是阿以和谈问题。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只是就一些迫在眉睫的敏感问题达成权宜之计,而水资源和难民回归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这犹如一座座活火山,随时可能爆发。2.核威慑的潜在性。众多资料和事实显示,以色列在世界核国家中居第6位,其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虽不及法国和英国,但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8]然而,以色列官方始终对其核活动讳莫如深,不承认,也不否认其拥有核武器。这样一来,以色列既可能维持其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核威慑力量,又可以抑制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发展核武器计划,为美国在核问题上袒护以色列提供基础。

(四)地区外势力的干预和干涉。历次阿以战争均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干涉。例如在2006年夏季的黎以冲突中,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受到了美法等国的约束,进行的只是一场有限战争。^[9]以色列经不起长时期的战争状态,也难以进行多点同时作战。因此,外部势力的干预往往为以色列争取时间,集中力量打击重点目标赢得了时间和机会,也为以色列结束战争、巩固胜利果实提供了基础。^[10]

以色列实行的是完全意义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强调国际体系中的“霍布斯主义”性质。国际安全的稀缺性导致国家之间为获取安全而展开激烈竞争,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建国伊始,以色列为求生存、求和平而被迫进行战争,后来占领土以求安全保障,以领土求安全,但始终未能获得绝对安全。根据联合国“土地换和平”计划,以色列需要交出所占领土以换取阿拉伯邻国的信任。从安全战略上讲,这些领土对以色列的安全防御至关重要。以色列认为,它是将有形的战略资产换取难以兑现的承诺,一种随时可以反悔的东西。

以色列通过建立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均势保障国家安全。更确切地说,以色列追求的是对

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优势。一般而言,均势的目的往往就是避免对手优势的出现。然而,以色列相信越强越大越安全的威慑政策。为了获得绝对安全,以色列竭力压制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杜绝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对自己构成威胁。

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以色列与土耳其和印度构筑了战略合作关系。^[11]以色列积极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有着多层考虑:首先,印度的地区大国地位及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提升两国关系可以提升以色列的政治地位,扩大以色列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其次,寻求与印度开展安全合作。印以拥有共同安全利益,“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两国的共同敌人”。最后,谋求印度的外交支持,并利用印、阿传统友好关系,推动印度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12]

一般来说,均势是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自在的均势”,指国际关系特定状态与运行规律的描述,即认为均势是“历史的一种普遍规律”,是国际关系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特定归宿;二是人为的均势,作为主观表达,它是一国对外战略的选择。^[13]如果说“安全困境”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认识,那么,“均势原则”就应该是人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选择。它更像一种权宜之计,与“同盟”政策一样,始终面临着一种“围城”式的困境。

然而,纵观均势演进史,均势的目的和结果往往相背离。均势的目的就是维持稳定、防止战争。然而,自现代国际体系诞生以来,一方面均势确实防止了战争的频繁爆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抑或是雅尔塔体系都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已经发生的大多数战争亦均源于均势,均势似乎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从以色列促进国家安全利益的进程来看,以色列实行的均势战略并未能阻止战争,保证以色列国家的绝对安全。

三、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博弈论分析

严格地说,博弈论只是一种应用范围相当广泛的科学研究方法。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二者的区别在于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相互作用时,当事各方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能,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集体理性,提倡效率、公正、公平;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个体最优决策,其结果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14]因此,“为了玩得出色,竞赛者必须懂得自己要得到什么,还必须明白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他们对行为后果的认识是不确定的,因为在一场典型的竞争中,一方行动的结果将有赖于其对手所采取的行动。”^[15]博弈成为一种利用规则

取得利益最优化的一种技巧。

以色列寻求国家安全的战略可以利用两个博弈模式进行分析。第一种博弈模式类似于“囚徒困境”,它主要体现在以色列与其邻国,特别是巴勒斯坦之间。如下图所示:

		巴勒斯坦	
		合作	对抗
以色列	合作	(3 3)	(1 4)
	对抗	(4 1)	(2 2)

从博弈二式矩形阵看,这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模式。然而实际上,博弈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称的。一是掌握信息多少的不对称;二是实力上的不对称。对巴以双方来说,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以色列凭借其强势地位,要取得相对获益最大值的最优化选择是相对强硬(4-1=3),不与巴勒斯坦进行合作,同时迫使巴勒斯坦合作。次优是在巴勒斯坦采取合作的前提下进行合作,赢得主动。对于巴勒斯坦而言,似乎也存在同样的战略选择。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巴勒斯坦方面实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较小。巴勒斯坦比较实际的选择是在对抗失败后再进行合作,并力图压制以色列也合作,得到绝对获益的最大化(3)。

在中东问题上,能够直接影响以色列对外政策的国家只有美国。因此,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进行相互博弈的同时,还存在一个与美国之间的博弈模式。对美国而言,它具有是否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两种选择。只有在介入巴勒斯坦问题之后才可能与以色列进行博弈。如下图所示:

		以色列	
		合作	对抗
美国	介入	(3 3)	(-1 0)
	不介入	(1 3)	

美国虽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但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并不完全受美国控制。美以在安全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以色列既担心美国的中东政策太强硬,压它让步;又担心美国的中东政策太软弱,不履行对以色列安全承担的义务。假如美国坚决压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进行谈判,以色列被迫压制民意与巴勒斯坦实现和解,阿、美、以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然而,美国在中东问题上,难以进行重新选择。美国在中东最可信赖的盟友只有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不惜一切代价不与巴勒斯坦合作,美国也决不会伤害与以色列维系了几十年的亲密关系。断绝美以战略关系对美国的损失会更大(-1)。美国内犹太势力的影响也决定了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施加的影响极其有限。美国最终会选择不介入或与以色列合作。以色列当然明白这一点,如果不能获得绝对安全,不能满足其最大的安全利益,以色列

会勇敢地与巴勒斯坦一直僵持下去, 美国最终也不会抛弃以色列迎合巴勒斯坦。

然而, 我们从两个博弈模式中可以发现, 对于中东整体安全局势而言, 实行安全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战略选择应该是合作, 只有合作, 各方才能够获益。然而, 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并不表示其会在安全问题上让步, 只有当巴勒斯坦和美国也能够采取与以色列合作的战略时, 以色列才能够进行战略合作; 否则即使得不到外部安全保障, 以色列也必须实施强硬的对外安全战略。以色列绝对不会获得低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相对安全系数。

四、简短评论

以色列欲通过均势和博弈的原则来解决自身的安全困境难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以色列摆脱安全困境以及中东安全局势的改善, 需要以色列和伊斯兰世界双方均做出努力。从根本上看, 关键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

(一) 建立互信机制。安全困境源于双方之间

的不信任, 只有双方建立互信机制, 不再以邻为敌, 而是以邻为伴, 以邻为善, 才能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以色列的安全困境本质上属于传统安全问题, 阿以双方长期紧张的对峙状态阻碍了互信机制的建立。阿以之间只有以诚相待、抛弃前嫌, 以互信为基础进行对话和谈判, 以发展的眼光解决历史问题。

(二) 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安全合作机制有助于国家确立自己的利益和规范自身的行为, 克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对以色列而言, 必须与阿拉伯世界在互信基础上通过谈判、军控和裁军等方式建立起广泛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从近期看, 以色列已经开始抛弃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同时协商寻求解决所有问题的政策, 而是在具体问题上与具体国家进行协商, 寻求实现外交突破, 缓解双边外交关系。只有存在和解的动机, 才会有和解的行动。只有当以色列实现了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性和解, 中东和平进程才会有“和平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秦亚青.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7
- [2] John H. Herz.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1976: 72-73.
- [3] [美] 罗伯特·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M]. 秦亚青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68-69
- [4]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the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M].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 [5] Moshe Efrat, Jacob Bercoitch. Superpowers and Client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mbalance of Influen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6] 朱威烈.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178.
- [7] 孙守鹏. 巴以安全困境及美国的中东政策 [J]. 西亚非洲, 2002(4): 4
- [8] Avner Cohen and Thomas Graham. An NPT for Non-members [J].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0, No 3, May/June 2004: 42
- [9] 孙德刚, 赵伟明. 有限战争理论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J]. 西亚非洲, 2006(6): 5-10
- [10] Avi Kober. Great-Power Involvement and Israeli Battlefield Success in the Arab-Israeli Wars, 1948-1982 [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8, No 1, Winter 2006: 20-48.
- [11] P. R. Kumaraswamy. India and Israel: Emerging Partnership [J].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6, NO 3, 2003: 192-206
- [12] 唐志超. 印度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及其影响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8): 8.
- [13] 王义桅, 倪世雄. 霸权均势: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 [J]. 美国研究, 2000(1): 11.
- [14]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分店, 1997: 5.
- [15] [美] 卡尔·多伊奇. 国际关系分析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181.

Realistic Analysis of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ZHOU Shi-xin

(The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6,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 three strata of serious structural security dilemma related to Israel national security, that i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units. Israel national security is contradictory to its civilian security. Security issues may break out at any frequently intervened by the outer powers. Israel security appeals clash with those of the Arab-Islamic World. Israel's realistic security policy by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establishing strategic preponderance, to ameliorate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hasn't helped Israel shakes off the shackle of security dilemma. Analysis of two types of game models indicates that only by establishing the effective security cooperation regime with Arab-Islamic world on the basis of mutual security trust can Israel finds its ultimate security way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Key words Israel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Security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 晓春]